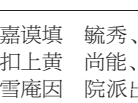
老上海的金曲

朱争平

老上海的金曲即上世纪20至40年代诞生于上海的流行歌曲。这些优美动人的歌曲曾经装饰过一个繁华时代，铸就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绚丽高峰。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客观认识通俗音乐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很有帮助。

一股音乐潮流的兴起，总是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有关。上世纪20至40年代，上海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的特征，经济畸形繁荣，西方特别是美国流行音乐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电台等媒介流入申城，加之中国学堂乐歌的开设，市民文化生活和情感世界中已出现对流行音乐的需求。老上海的流行音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从音乐家黎锦晖1927年发表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毛毛雨》起到1949年，前后20余年时间，约有8000余首流行歌曲在上海诞生。这些歌曲大量的是以爱情和城市生活为主题，其中也包括抗战爆发后上海音乐人创作的流行于民众间的抗日救亡歌曲。这些歌曲借助广播、电影、唱片和舞台等各种传媒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许多优秀作品传唱至今，成为华人世界中永恒的怀旧金曲。

老上海的流行音乐造就了中国近代一批著名音乐人。黎锦晖是中国儿童歌舞剧的创始人、中国歌舞学校的创办者，也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鼻祖。他的《毛毛雨》开创了中国音乐文化的新门类，标志着中国歌坛一个时代的诞生。此后10年间，他创作的流行歌曲至少有400余首。抗战爆发后，他创作了一批抗日救亡歌曲，当时红军队伍中就流行过他的《中华民族战歌》《十里送夫》歌。享有“歌王”之誉的黎锦光和“歌仙”之誉的陈歌辛是老上海流行乐坛的杰出代表。黎锦光的《夜来香》《采槟榔》《五月的风》，陈歌辛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处处开》《渔家女》至今盛唱不衰。《何日君再来》是作曲家刘雪庵1932年在上海国立音专读书期间为同学联欢会写的曲子，1937年这首曲子成为影片《三星伴月》的插曲，由黄嘉谟填词。后来这首歌被扣上黄色歌曲的帽子，刘雪庵因此背了几十年的黑锅，直至1979年才恢复名誉。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位著名音乐家创作的《上前线》《长城谣》等歌曲，是当时中国抗日歌曲的力作。那个时期的著名音乐家还有任光、严个凡、贺绿汀、安娥、严折西、聂耳、黄贻钧、李厚襄、刘如曾等。任光、安娥的《渔光曲》，贺绿汀的《天涯歌女》《游击队歌》，聂耳的《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黄贻钧的《花好月圆》，刘如曾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已成为中国歌坛的经典作品，《义勇军进行曲》建国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老上海歌坛唱红了中国近代一批著名歌星。周璇、龚秋霞、白光、李香兰、姚莉、白虹、吴莺音被誉为老上海歌坛的七大歌星。陈娟娟、陈云裳、陈燕燕是老上海影坛、歌坛声形辉映的“三陈”。周淑安、黄友葵、喻宜萱、周小燕、郎毓秀、斯义桂、蔡绍序、应尚能、胡然等是老上海学院派出身的著名歌唱家。姚敏、王人美、李丽华、胡蝶、欧阳飞莺、张露、云云、张伊雯等也都是那个年代的红歌星。“金嗓子”周璇因灌录唱片最多，被称为“华人唱片第一人”，她演唱的《夜上海》被称为上海的“音乐名片”。龚秋霞因歌喉甜润婉转，享有“银嗓子”的美称，凄婉哀怨的《秋水伊人》让人回味不已。白虹曾在1934年上海举办的“播音歌星竞赛”中荣获第一名，是老上海第一个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星，有“歌唱皇后”的美誉。

老上海金曲诞生的年代距今已近一个世纪。建国后的30多年中，以爱情和城市生活为主题的老上海金曲被认为是“靡靡之音”而遭封杀。改革开放后，对老上海金曲有了重新研究和认识。其实在香港和东南亚华人界，在老上海人的心里，这些金曲从来就没有失去过生命力。回眸往昔，老上海的那段音乐历史是值得珍视的。在短短20余年时间里，一个城市出现了引领一个时代音乐的潮流，诞生了那么多的金曲、音乐家和歌星，这是这座城市的骄傲。

音乐创作如何反映人类普遍的情感需求，同时又在音乐本体的艺术创造中融合中西、不断创新，引领社会的审美情趣，老上海金曲对我们不无启迪。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富有意义的世界

奥斯维辛集中营旁边阳光灿烂的小街上，咖啡馆一家连着一家，中午时分家家都坐满了人，人们在阳光里如释重负。一切都因为这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目睹了历史中黑暗的遗留物后，人们就能激赏日常生活的美好吧。

人们三三两两在阳光下走动，带着强烈的自由痕迹，慢腾腾的，若有所思的。如果不在这里，这姿势会被人忽略，那样子看上去有点松懈和傻。街边咖啡馆敞开的窗里散发出咖啡新鲜的香气，要不是这里，咖啡大概发不出如此入心的香气。

遮阳伞下有人在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念品商店买来的明信片上写字。黑白照片里，生锈的铁轨穿过带有岗楼的大门，中欧春季和煦的阳光下，废弃半个多世纪却仍旧非常结实的枕木旁，蒲公英开了花。在欧洲这是情人们用于算卦的花，一瓣瓣剥下花瓣，数着：爱，不爱，爱，不爱，最后一瓣就是答案。

一个旅行者去看世界时，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处处留下伤痕的世界。正是这样的世界，最终能久久留在旅行者心中，陪伴他经过自己生活中的艰难时世。各种哀伤和悲剧洋溢出的诗意，留在旅行者心里，就像放在衣柜深处的玫瑰油那样，散发经久不息的芳香。一个富有意义的世界就是由大地上星罗棋布的伤痕组成的。

沉着浑朴 纵横洒脱

——吴昌硕铭鹅砚

童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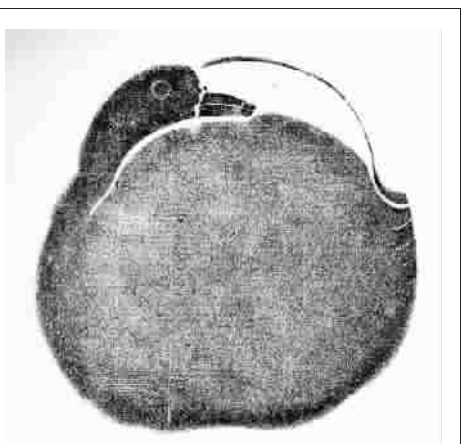
书圣王羲之书法，变古制今，载誉千年。唐代书家欧阳询曰：“至于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惟右军王逸少一人而已。”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兰亭修禊、右军书扇、羲之爱鹅，诸多雅闻逸韵，千古流传。笔者近见吴昌硕铭书“鹅砚”一方，即为羲之爱鹅之遗韵。

吴昌砚书鹅砚（见图），长12厘米，宽12.5厘米，厚1厘米，通体雕成鹅盘卧状，转颈曲身，头居左上，其眼凝视，颇得传神之妙，其嘴尖硬，其尾柔软，皆以简洁之法为之，中部大片为砚堂。此砚形简繁得当，温纯古雅，极富静谧情趣。砚色青紫，细腻润泽，并有鱼脑、青花、火捺等石品纹理。砚背吴昌硕以行草书之，文曰：“养墨池，作文玩，自写黄庭不须换，乙卯岁十一月，石友铭，属吴昌硕书。”此砚为沈石友《沈氏砚林》著录，时年为1915年，吴昌硕72岁，沈石友58岁。

此吴昌硕砚铭文作六行，正文落款各三行，高低错落，前后贯通，一气呵成。“墨池”两字的宽博开阔；“玩、换”两字的使转顿挫；落款的墨劲墨丰，均使此铭书高古浑穆之气扑人眉宇。

沈石友《沈氏砚林》中的吴昌硕铭书，均为赵石（1874–1933）镌刻，赵石刻砚的最大特色是摹刻精到、惟肖惟妙，纵观《沈氏砚林》中的吴昌硕铭书，或大或小，或篆或楷，或梅花或人物，均有笔有墨，生机勃勃，若现纸上，赵石精摹之技，可谓空前绝后。据观察，吴昌硕的砚铭是先书于纸上，然后由赵石摹勒上石而镌刻。赵氏擅书精刻，对昌硕先生之用笔用墨娴熟胸中，故镌刻时能依形传神，势完意足。如砚中“池、属”两字的长划枯笔；“墨、岁”两字的转折提按；乃至“乙”字极细的上挑枯笔，均能毫发不损地展现。赵石刻砚既现吴昌硕古朴雄浑，大气澎渤之势，又现其中锋独调，细致入微之妙，可谓“既雕既琢，还返于朴。”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砚谱中，《沈氏砚林》真可称“砚与人并传，文与字并绝，加之刻工精妙”而可传世矣！

艺苑清赏



此砚铭中所言的黄庭经，即指《上清黄庭内景经》和《上清黄庭外景经》，以述道家养生修炼之理，观察五藏，而重于脾土，若“方寸之中谨盖藏，精神还归老复壮……”皆以七言歌诀述之。小楷《黄庭经》为王羲之所书，乃《黄庭外景经》，全帖60行，计1200余字。在唐玄宗所收掇的王字共158卷中，《黄庭经》列为第一，惟真迹久佚，传世刻本极多，其中以《修太平本》《越州石氏本》为佳。世传王羲之写经换鹅即指此经。《晋书·王羲之传》误载为《道德经》，而李白的“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之句，则流传最广矣！

贴纸驱邪治夜啼

郭树清

早年在家乡崇明岛上，流传着婴幼儿夜啼贴纸驱邪的习俗。

黎明时分，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时常见到村头乡尾的墙头上、电线杆上、猪棚、厕所等醒目的地方，张贴着巴掌大小的红纸，上面用毛笔或钢笔抄写着固定的字句：“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此时，只见大人们停下脚步边看边念，孩子们也总会好奇地凑上前去，探个究竟，也有调皮的孩子把它撕下来取乐。然而，没过几天，又在同一地方，贴上同样内容的纸条，同样围着一帮人在边看边念……

当时，对这一情景，孩子们只是好奇，不明其意，后来我们从大人们的口中得知，有些人家的婴儿刚刚生下后，一到晚上哭闹不停，不仅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也让大人难以安寝，便采取张贴纸条的方式用以驱邪治夜啼。其实，婴幼儿夜啼有着多种原因，或因消化不良，或因环境不适应，或因口渴饥饿，或因白天睡多了，一到夜里过于兴奋啼哭不止。由于当时乡村缺医少药，人们又不懂医疗知识，但求医心切，祈盼着孩子的夜啼早点治好，认为是中了邪了，贴一张“夜哭郎”的纸条便能驱邪，让孩子安睡好，不哭闹。然而，这种迷信活动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使得夜哭婴幼儿的病情加重，甚至还会延误治疗时机而留下隐患。那时候，因得不到及时治疗使婴幼儿夭折的事情在乡间时有发生。当然也有碰运气贴了纸条后婴幼儿的夜啼停止了，其实那是小孩病轻，不治而愈，迷信的人还以为是贴纸条贴好的。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乡村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不断普及，张贴“夜哭郎”纸条的现象早已不见了踪影。然而，对于贴“夜哭郎”纸条的习俗，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有流传，但是，它从何时何地兴起，无法考证。往事悠悠，昔日乡间那婴儿夜啼贴纸驱邪的民俗却深深地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里。

西湖长

那秋生

北宋苏轼自述：“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三邦，辄为西湖之长。”（见《东坡志林》）于是他有了一个“西湖长”的美称，因为他曾被贬职到杭州、颍州、惠州，恰好三地皆有“西湖”，作为地方长官，他颇有政绩，赢得了百姓的好口碑。苏东坡是第一个以“西子”来咏叹西湖的，他称杭州西湖是“吴宫西子”，而惠州西湖在偏僻之地，是“苎萝西子”。（注：苎萝是西子出生的乡村）

兰花心情

赵化南

我对兰花有好意，全因为古人的文字。周易中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其言，其臭（气味）如兰。”屈原有“纫秋兰以为佩”句，在九歌中也写“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两千多年前，兰就成了高尚君子的饰物，可见它的高贵，又喻为美人，可见它被接受的非同寻常的美丽。

不过，古人所说的兰，并不是现今常说的兰，那是一种香草的名字，称作兰草，山野自生，花紫色，香气清远，古人常刈而佩之，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后人把古人对它的称颂，施予给了各种草兰。我没见过古人所说的兰，或者见到过但不认得，心目中的兰，自是画中的或是通常盆栽的，也像许多人一样，把古人对兰的颂辞理解为是给它们的。但话也说回来，画中的或是盆栽的兰，也确是风姿绰约，婀娜清高，幽香沁心，它们并未僭妄，没有亵渎了那些好辞。

一日逛花鸟市场，见一脸色黝黑的妇女在卖兰花，一张木板台上躺放着许多，她称是贵州名种，但听她口音却来自浙江，当然，浙江人也可卖贵州货。我不懂贵州的兰花是不是名种，不懂名种应该生长在哪里，也不懂名种与非名种的区别，总之一窍也不通，但见它们叶茎细长而尖，长约尺许，中间有平行细脉，老绿色，柔软而蕴着弹力，一株约十五六片叶，看着很是喜人，标价每株四十元，有人还价她十五元也卖了，很肯退让的。我有买的冲动，又踟蹰，因不懂怎么养植，听说它们娇贵，极难服侍，君子美人在我手里枯萎了，岂不罪过，便先问怎么养法。妇人答说便当，二十天浇次水，浇水要浇透，偶尔晒晒太阳。我问会开花么。她说当然，一年开两次。我要知道的都知道了，请她帮着挑了三株。

我把三株兰植在一只青花瓷花盆里，遵照妇女所教种养，心中忐忑着它们能否存活。我是深秋时带它们回家的，放在阳台的荫凉处，它们活着，居然活到了寒冬，且活得很健康，叶子没一片枯黄，几茎小叶也抽长成细长苗条的大叶，这使我欣喜。我怕它们受不了严寒，搬到书房窗台上，它们似乎并不在意环境的变换，只是停止了生长，那绿色，那富于生气的纤巧，始终保持着原来模样。冬天逝去，第二年的春天到来，我仍让它们留在书房窗台上，施了些许有机肥料，很慢很慢很慢的，萌出了几片嫩绿新叶，生命因春天而活泼。但兰的活泼是矜持的，内敛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张扬，仅长了几片叶子而已，不像一般植物因得时而疯长，好像故意要让人看到它们何等地欣欣向荣，何等的艳丽妩媚。兰不动声色，或者说是不屑于动声色，大有“不借外景为襟怀，不以尘识染性情”的高士风韵。

清明过后没有几天，我意外发现近它根部的土里生出一支芽来，嫩绿微黄，不像叶芽那样扁平，是细细的圆柱形，是花茎吗？我殷切地盼望它是，每天留心观察，太慢了，它长得真是太慢，叫人心焦着又耐心着，但它毕竟还是露出了真容，确实是花茎，高约三四寸。我怀着欢悦心情陪伴着它长出五个花蕾，陪伴着花蕾成熟，陪伴第一朵花缓缓绽放，花瓣纤柔，长只一厘米，呈淡黄绿色，十分的雅致，后来四朵也开了，一茎五花上下排列，美得宁谧，美得含蓄，美得澹泊，美得高贵，有缕清净的香气，很淡，淡到闻不到，但又闻得到，不似在鼻端，更似在心里，花期亦长，有两周光景。这两周我始终有种莫名的怡然好心情，忘了这两周里是否遇到过不愉快的事，即便有，也被它们无声地融消掉了，没在心底留下丝毫痕迹，流过的是几句很惬意的句子：“手培兰蕊两三栽，日暖风和次第开，久坐不知香在室，推窗时有蝶飞来。”这是元朝诗人的咏兰诗，看得出他在室内养兰，很有心得。我呢，窗外没有飞来蝴蝶，而是飞来了蜜蜂。

十日谈

兰之恋

明起刊登一组《人生囧事》，责任编辑：徐婉青。